

近代

Transl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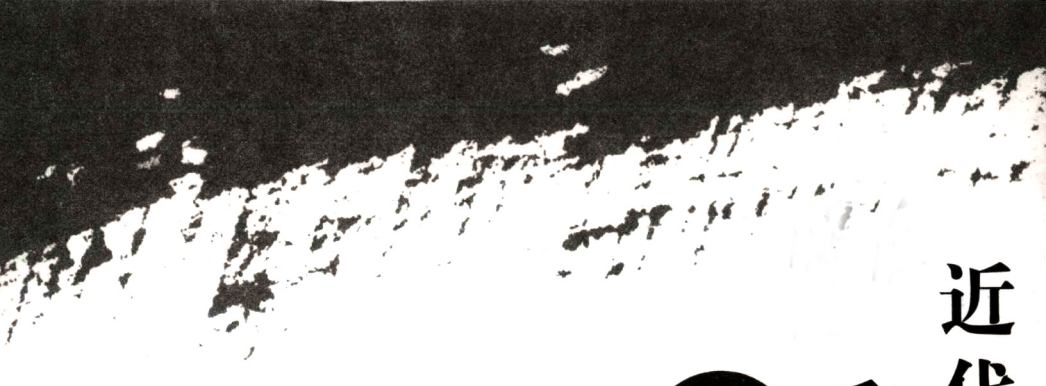
翻译

思想的演进

郑意长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近代

翻译思想的

演进

郑意长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近代翻译思想的演进 / 郑意长著.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80696-850-5

I. ①近… II. ①郑… III. ①翻译—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H059-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79187号

近代翻译思想的演进

郑意长/著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http://www.tjabc.net>

E-mail: tjgj@tjabc.net

唐山天意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7.375 字数200千字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696-850-5

定 价: 30.00元

序

郑意长是我的博士生，在他结束博士论文答辩离开复旦不到两个月时，突然给我发来一封电子邮件，说他的博士论文已交出版社，马上要出版，希望我能为他写篇序，时间限定为“五天之内”。这让我真是又惊又喜：惊的是，他居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联系好了出版社，且出版社愿意马上付诸出版，否则绝不会“限定”我“五天”内交稿——这可是对我这个导师下的绝对紧迫的没有商量余地的“限令”；喜的是，他的论文能够如此快地正式付诸出版，说明论文的质量不仅答辩委员会认可（评价是“优秀”），且出版社那儿也没有遇到麻烦，这在我的已经毕业的学生中还是头一回，作为他的指导老师，应该说我是甚感欣慰的，也正因为此，在接到信的第二天，我就毫不犹豫地放下了手头所有杂事，提前动笔写了这篇短序。

郑意长博士论文的题目是“近代翻译思想之演进及其现代阐释”，这个题目完全是他自己独立思考后选定的，我只是提了点修改参考意见。这是个他比较熟悉、擅长的选题。他是外语系英语专业出身，本科、硕士阶段念的都是英语，毕业后在天津财经大学外语系任教，从事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是中英文的翻译及其研究。应该说，对翻译思想作研究，是他的专长，也是专业的需要，而对近代翻译思想作现代西方理论和理性意识下的阐释，则是一个迄今尚未有人专门涉及过的课题。

众所周知，中国的近代时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不仅中国长期以来的封建社会体制开始发生了变化，更重要的是文化（包括文学）发生了巨变。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和文学在这

个时期开始出现了包括内容和形式等多方面的质变，这种质变，导致了中国的传统文化逐步走向了现代化，中国的传统文学逐步演变成了现代文学。这当中，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本身内在的潜在因子固然不可忽视，但外来文化、思潮和文学的冲击，则是无可否认的重要条件，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先决前提。没有外来文化思潮的强烈冲击，中国社会文化的近代变革恐怕是不可能实现的，至少还要推迟几十年，甚至更长。我们今天学界所谓的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其实它的实质性阶段也就在近代时期。而外来文化的引进和冲击的先决因素，乃是翻译，即，将西方的语言翻译成中文（汉语）。没有这个先决因素，中国人很难也不可能一下子接受外来的文化和文学，这当中，近代一批有识之士的从事翻译工作，起了很重要的桥梁作用。在认识这一点的过程中，我们往往比较重视的是翻译本身，当然还包括对翻译意义、价值和方法的认识。这方面，已经有很多论著作了详尽的论述和分析评价，但对于近代时期翻译中所体现的翻译思想，以及这些翻译思想如何在近代时期逐步演进，我们今天又如何从更宏阔的高度对此演进加以阐发和分析，特别是如何运用西方现代翻译理论作现代意识条件下的阐释，似乎学界还没有专门的论述。郑意长的这篇博士论文，在这方面作了大胆可喜的探索，博得了包括复旦大学翻译系主任在内的专家们的好评，这是可以令人欣慰的。论文的可喜之处还在于，全文的条理结构非常清晰，语言也比较流畅，尤其每个论述的标题都巧妙地引用了近代翻译者或评论者涉及翻译思想或主张的原话，既形象真切，又醒目点题，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对于一个本、硕均外语系出身的博士生来说，特别难能可贵。

当然，本书还有可充实提高的余地。对郑意长本人来说，这是他的第一本著作，前面的路还很长。我相信，在今后的学术研究道路上，只要他坚持不懈，继续努力，一定还会有更多的成果问世，我欣喜地期待着。

徐志啸 于复旦大学

目
录

绪论 / 1

第一章 前人研究综述及本研究之理论参照、意义及
内容 / 6

第一节 近代翻译思想已有研究述略 / 6

第二节 本研究之理论参照 / 21

第三节 意义及内容简介 / 29

第二章 近代翻译思想的小说翻译功能观之演进 / 35

第一节 从“广中土之见闻”到“小说为国民之魂”
/ 35第二节 从“顾以中西文异，虽欲私淑，亦莫得所
从”到“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
/ 43第三节 小结——在强大而又衰落的文化系统中“自
我定位” / 50

第三章 近代翻译思想的文本选择观之演进 / 59

第一节 从“莫如新闻纸之善矣”到“择当译之本”
/ 59

第二节 从“哈葛得之流”到“只译名家著作” / 65

第三节 从“短篇便等于无物”到“芥子里面藏着大
千世界” / 70第四节 从“用力甚鲜，而获益甚巨”到“译者未必
能无失其意也” / 73

第五节 小结——历史大变革中不断修正的“预备规范” / 78

第四章 近代翻译思想的翻译方法论之演进 / 82

第一节 从“译事三难：信、达、雅”到“译意不译词” / 83

第二节 从“不若纯用元书之为尤美”到“任情删易，即为不诚” / 90

第三节 小结——对待“文化他者”彷徨态度的表露 / 97

第五章 近代翻译思想的叙事模式之演进 / 104

第一节 从“使人堕五里雾中，茫不知其来由”到“若此节则原书所有，万不能易” / 105

第二节 从“法国前驻俄公使某君所著”到“书系人作者口气，今仍其体例” / 112

第三节 从“纯以中国说部体段代之”到“写景至美，而感情强烈，至足动人” / 120

第四节 小结——特殊文化语境下的文化改写 / 131

第六章 近代翻译思想的译本文体观之演进 / 141

第一节 从“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到“全非抄袭旧小说的白话，乃是一种特创的白话” / 142

第二节 从“好在小说重关目，不重名词也”到“翻译名义之当从音译，抑从义译，此必视制语时之情况为衡” / 152

第三节 小结——译本文体——近代文学话语建设中的“第三语码” / 158

结语 / 167

附录一 中国近代翻译思想大事年表 / 176

附录二 中国近代主要翻译思想家简介 / 196

参考文献 / 212

后记 / 226

绪 论

“凡一民族之文化，其容纳性愈富者，其增展力愈强，此定理也。”^①无疑，“容纳性”与“增展力”都与翻译行为、翻译思想密不可分。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翻译文学异军突起，它给沉闷的清末文坛带来了新鲜空气，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三次翻译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民族与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和文化冲击。在近代这股强劲的翻译文学热潮中，翻译小说的实绩和社会影响力是有目共睹的。1873年蠡勺居士翻译了英国作家利顿（E. Lytton, 1803—1873）的小说《夜与晨》（Night and Morning）取名《听夕闲谈》，并连续刊载于《申报》的文艺副刊《瀛寰琐纪》第3—28期。自此之后，翻译小说如雨后春笋一发而不可收。“1911年，《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著录创作小说120种，翻译小说400种。”^②而另据统计，“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至宣统三年（1911），清王朝最后9年所出的小说占近代小说总数的88.73%，通俗小说占89.42%，翻译小说所占比例高达94.58%；若自光绪二十一年起算，则最后17年所出的小说占近代小说总数的94.53%，其中通俗小说占95.90%，翻译小说所占比例更高达99.20%。”^③由此可见，翻译小说在近代文学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① 梁启超：《梁启超讲国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190页。

② 施蛰存《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导言，《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1），上海书店，1990年，17—18页。

③ 陈大康《近代小说及其研究的数理描述》，《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4期，69页。

葛兆光认为：“一旦要在已经天经地义的传统原则之外，另寻普遍适用的‘通例’，对于思想史来说，就是一个意义极其深远的根本性转变，对于一直浸淫在传统中的士人来说也是极其艰难的选择，因为在传统之外寻求，显然需要来自异文明资源。”^① 这样，近代中国在国门被迫打开之后，西学东渐已不可逆转。《中外小说林》载文指出：“二十世纪开幕，为吾国小说界发达之滥觞。文明初渡，固乞灵于译本……”^②，此语可谓切中肯綮。文学巨匠鲁迅先生在谈及他的小说创作时，坦言说：“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③，鲁迅所言之“外国作品”显然不乏林纾等译界前辈翻译的西方小说作品。因此，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坚定地指出：“不过无论是采用怎样的形式，大部分作品，都曾直接、间接受到西洋文学的影响，那是很显然的。”^④ 陈平原也肯定地认为：“可以这样说，没有从晚清开始的对域外小说的积极介绍和借鉴，中国小说不可能产生如此脱胎换骨的变化。”^⑤ 毋庸赘言，是翻译文学尤其是其中作为生力军的翻译小说为我们带来了他山之石。

因此，这一阶段的翻译小说毫无疑问地成为中西文学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这是任何治比较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思想史的学者都不能忽视的研究领域。与此同时，这场史无前例的小说翻译高潮还为我们带来了丰富的文学翻译思想，诸多译界巨擘以自身的小说翻译实践为基础，对翻译这一既具体而又抽象的人类独有的文化活动进行了各自不同的思考。众所周知，中国近代的翻译

① 葛兆光《清代考据学：重建社会与思想基础的尝试——十八、十九世纪之际考据学的转向》，陈平原、王德威、商伟《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26页。

② 黄伯耀《小说与风俗之关系》，《中外小说林》1908年第5期。

③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文集》（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444页。

④ 阿英：《晚清小说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6—7页。

⑤ 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24页。

界并未像西方学界那样拥有经典的、系统的翻译理论专著供后人研究，但散见于译著、译文、论文以及译文序跋等处的翻译思想和主张同样闪烁着学术光辉，正是这些看似凌乱无序的点点滴滴左右着中国近代文学翻译乃至文学创作的前进方向，为现代中国翻译理论做了坚实的理论铺垫。

放眼国际译坛，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翻译理论界的研究开始突破传统的美学或语言学模式，逐渐形成了“描写翻译学”^①。进入 90 年代以后，以巴斯奈特与勒菲弗尔主编的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为里程碑，“描写翻译理论”出现了“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②，“文化转向”开拓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为传统的语言翻译学提供了新的借鉴，也为翻译批评提供了新的认识。所谓“描写翻译理论”就是：“描写性翻译研究在研究翻译的过程、产物以及功能的时候，把翻译放在时代之中去研究。广而言之，是把翻译放到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文化之中去研究”^③。伊文—佐哈（Even-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图里（Toury）的“描写翻译学”、勒菲维尔（Lefevere）的“文本操控理论”等都可统归为“描写翻译理论”^④，这些译论的共性就是抛弃规定性，提倡描写性。因此，“描写性”就是指一种用思想语言手段来系统有序地展现事物状态的方法，它首先意味着运用那些产生于直观对象本身之中的概念来表征直观对象。描写不仅仅是经验科学的操作方式，也是本质科学的方法程序。它是一种本质直观的描述分析，即通过本质直观，从变化多样的意识中直觉到其不变的本质结构。这些“描写翻译理论”的目的不再是创造和总结一套方法和策略以生产出完美的翻译文本，而是让人们

① Holmes, James S. *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Amsterdam: Rodopi, 1994: 67—80.

② Bassnett, S and Lefevere A.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London: Cassell, 1990: 8.

③ Tymoczko, Maria. *Translation in a Postcolonial Context: Early Irish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9: 25.

④ 林克难《翻译研究：从规范走向描写》，《中国翻译》2001年第6期，44页。

更加全面而又科学地认知翻译的过程。

“描写翻译理论”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苏珊·巴斯奈特就认为“翻译总是在一个复杂连续体而不是真空之内发生，有着诸多影响译者的文本和超文本因素”^①。“描写翻译理论”者纷纷抛开语言学翻译理论纠缠不休的字词层面的“等值”、“对等”等问题，注重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文化对翻译的干扰和制约作用。因此，翻译已被视为一种文化交流行为，一种影响并可能改造目标语文化的重要外来元素。吉迪恩·图里犀利地指出：“（我们）所缺少的，并不是显示出敏锐直觉和洞察力的孤立的研究（许多现有的研究的确做到了），而是一个从清晰的假设开始，并具备尽可能明确的方法论及各种研究手段，可通过翻译研究本身来进行论证的、并有系统的分支。”^②这样，他们从文化的各个角度研究翻译主体和客体，对影响翻译策略、翻译方法、译本选择的各种因素作描写性的而不是规定性的研究。

如上所述，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的中国文坛，尤其是中国小说所经历的多方位的、自觉与不自觉的巨大变革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域外小说的翻译。在内忧外患的社会大背景下，在中西文明以特殊的方式交融的洪流中，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怀揣着各种翻译初衷所形成的极具特色的翻译思想是中国译学乃至世界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地梳理并研究中国近代翻译思想及其演进轨迹，无疑是中国近代小说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以及比较文学研究的题中之意。与此同时，“描写翻译理论”为我们以全新的角度来研究、诠释特定社会特定历史阶段的翻译文化和翻译思想提供了良好的理论视野。它“视文学为复杂的动态系统，深信理论模式与实际个案研究应该持续地相互作用，采取描述性的、倾向目标组织的、功能性的和系统性的文学翻译研究方法，并对制约着译作生成及接受的规范

① Bassnett, Susan and Andre Lefevere.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1998: 123.

② Toury, G.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PA: John Benjamins, 1995: 3.

和限制因素、翻译与其他类型的文本处理之间的关系、译作在特定文学中,以及在多种文学之间互动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等内容表示兴趣。”^① 所以,“描写学派的功劳在于给予各种各样的翻译以正确的定位。避免了由于规范性的翻译标准而造成的概念上的困惑以及无谓而又无止无休的争论。……还可以为繁荣翻译实践、丰富翻译手段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武器。”^②

因此,本书拟以“描写翻译理论”为理论参照,对中国近代翻译思想的演进从小说翻译功能观、文本选择观、翻译方法论、叙事模式、译本文体观五方面进行系统化的学理审视和现代性阐释,期盼能把握其演进的脉络和主干,捕捉其演进的规律性,进而获得对中国近代翻译思想的全新认知。

① Hermans, T.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a New Paradigm. In: T. Hermans.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Beckenham: Croom Helm, 1985: 10-11.

② 林克难《翻译研究:从规范走向描写》,《中国翻译》,2001年第6期,44-45页。

第一章 前人研究综述及 本研究之理论参照、意义及内容

在我们对近代翻译思想的演进作现代性阐释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学界在相关领域已作的研究进行综述，同时对本书所参照之理论及本研究的意义进行简要阐述。这样一是明确学界在这一领域已获得的理论成果和已达到的理论深度，阐明本书得以生长和汲取营养的学术源泉，另一方面说明本研究所期盼达到的与众不同的学术价值和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希冀突破和创新之处。

第一节 近代翻译思想已有研究述略

虽然近代翻译活动异常繁盛，但 1949 年之前对该阶段翻译思想的研究却寥寥无几。即便有，研究者也大多是从文学史的角度出发，相关成果也多以文学史或小说史论文或专著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形式存在。比较著名的有：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3 年）、郑振铎的《林琴南先生》（1924 年）、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阿英的《晚清小说史》（1935 年）等。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论及严复、林纾、周氏兄弟的翻译成就时说：

“严复、林纾的翻译文章，在当日虽然勉强供应了一时的要求，究竟不能支持下去。周作人兄弟的《域外小说集》便是这一派的最

高作品，但在适用一方面他们都大失败了。”^①

关于翻译方法，胡适认为周作人“用的是直译的方法，严格的尽量保全原文的文法与口气。这种译法，近年来很有人仿效，是国语的欧化的一个起点”^②。

郑振铎在《林琴南先生》中首先比较详细地列举了林纾的翻译成就，而后从缺点和功绩两方面对其翻译行为进行了评价。一方面，他认为林纾“所译的一百五十六种的作品中，仅有这六七十种是著名的”^③，而且“任意删节原文”^④；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林先生的翻译工作在当时也有很大的影响与功绩”^⑤。在丰富“中国人的关于世界的常识”^⑥、使时人“知道欧美亦有所谓文学”^⑦以及提高小说地位方面功不可没。

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专辟“翻译文学”一章，这足见他对近代文学翻译的重视。言及严复的翻译，他并未盲目苟同或认可严氏的译法，而是客观地说：“严复译书好用汉以前字法句法……这自然是他的缺点。不过他在当日要灌输一班老先生一点西洋思想，便不得不用古雅的文章来译，叫他们看得起译本，因而看得起西学，这也是他译书的一点苦心。”^⑧此外，他还对马君武、苏曼殊的诗歌翻译作了细致的研究。

阿英的《晚清小说史》一直被认为是研究中国近代小说的必读书目之一，其关于小说翻译的论述见于该书的最后一章即第十四章“翻译小说”。他在小说翻译与小说创作、翻译的理论与方法、著名

①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严云受《胡适学术代表作》（上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140页。

② 同上，160页。

③ 郑振铎《林琴南先生》，罗新璋《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187页。

④ 同上，188页。

⑤ 同上，190页。

⑥ 同上，190页。

⑦ 同上，191页。

⑧ 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 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85页。

译者及译作方面展开了论述。简言之,首先,他认为梁启超的《译印政治小说序》(光绪二十四年,1898)是阐明翻译小说重要性最初的理论文章,有助于国人提高对小说重要性的理解。其次,论及林纾时,他指出林氏“是中国以古文笔法译西洋小说的第一人”^①,虽有译本选择不当、误解曲解原作之瑕疵,但其影响甚巨。再次,阿英简单描述了近代翻译小说类型更替,即初期以政治翻译小说、教育翻译小说为主,其后文学性翻译小说渐多,“最后又发展到歧路上去,于是有大批侦探翻译小说的产生”^②。最后,他还以《域外小说集》为例对鲁迅的直译进行了简要论述。

虽然以上研究成果对此后近代翻译活动及翻译思想研究领域的发展有着筚路蓝缕之功,但总体来说1949年之前的研究大多以对翻译家及其翻译活动的一般性介绍为主,系统探究翻译思想者实属凤毛麟角。所以,施蛰存认为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至新中国成立“这三十年的文学翻译情况,既无文献可征,又无从事研究,竟成为一片洪荒未辟的处女地”^③。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由于种种原因对该领域的研究仍是进展缓慢。1981年,钱钟书《林纾的翻译》一文的问世标志着新时期近代翻译思想研究的崭新开端。此后,从各个不同角度对近代翻译文学(尤其是近代翻译小说)、近代翻译思想的研究著述如雨后春笋,在此仅对代表性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行简要回顾。

一、近代翻译思想宏观研究述略

对于近代林林总总的翻译思想,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宏观性审视和思考。韩永芝的《从文化排斥与文化认同看清末外国小说翻译》一文从文化翻译的视角出发,认为清末颇为兴盛的外国小说翻译大潮一方面介绍了西方的文化思想,另一方面明显的汉民族文化特征仍不容忽视。因为近代译者多具有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观

① 阿英:《晚清小说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212页。

② 同上,217页。

③ 施蛰存:《文艺百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95页。

念，因此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对原著进行特殊的、比较主观的处理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西方小说文化思想内容的翻译方面，“西方宗教观、伦理观与中国具体国情不同，其文学作品必然与中国文化发生抵牾，翻译者趋于沟通的心理，尽可能地使译作与中国文化相通”^①。在叙事技法的传递方面，“早期小说译者的文学修养主要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其译作的小说文体形式必然采用中国原有的通俗小说文体——章回体……中国传统小说一般以全知的第三人称行文，叙述者跳出故事之外，以无所不知的方式向读者讲述别人的故事。而西方文学中叙事方法则多种多样，包括第三人称、第一人称以及相互交错运用的较为庞杂的叙事方法等。由于中国读者已经习惯了第三人称的叙事方式，因此面对西方小说多样化的叙事模式，清末的译者们便对叙事角度作了一些改变”^②。在原著风格的翻译方面，“早期小说译者在翻译小说时非常注重小说的读者群，这些读者多属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文人阶层，其思维方式、审美习惯皆已定型。翻译者如果想拥有庞大的读者群，其译作就应该考虑到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审美情趣，突出小说消闲、怡情的文学特征。因此，外国小说译作的汉化便成了翻译者有意追求的一种语言风格”^③。

顾建新在《清末民初文学翻译方法与文学翻译文体的发展》一文中从翻译方法和翻译文体的角度指出：由于文学意识的不自觉、白话语体表达的幼稚性以及受众对象的特殊性等原因，在近代的文学翻译中，归化的手法、文言的文体和意译的方法颇受青睐。因此，“这种译述、意译的风气使得早期文学翻译的体例很不完备。译作大多不标明原作者，有时甚至连译者也都不署名。在译者看来，翻译外国文学主要是为了启迪民智、输入文明，并不是为流传后世。这

① 韩永芝《从文化排斥与文化认同看清末外国小说翻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67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68页。

也说明了译者潜意识中对翻译文学的轻度鄙视”^①。文学革命爆发后，文学翻译的目标读者出现“平民化”倾向，文学翻译文体走向通俗化、大众化，同时由于文学翻译中文学意识的不断增强，直译方法逐渐为越来越多的译者所使用，文学翻译开始走向异化。

关于近代翻译与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问题，吴莎、屠国元在《论中国近代翻译选材与意识形态的关系（1840—1919）》一文中以安德烈·勒菲弗尔关于意识形态对文本的操纵性改写的理论为依托，从历史文化角度，以意识形态为出发点研究和分析了中国近代的翻译活动，指出译入语文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近代翻译选材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和操控作用。“1840年—1919年的中国翻译史印证了勒菲弗尔（1992）的翻译理论。通过研究这个时期的翻译史，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翻译作品的兴盛是随着各个历史阶段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变化的。”^②例如：“甲午战争的失败把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摆在每个人的面前，富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救国必先强民，要教育群众，实行根本的改革，必须寻找一种可用的工具。此时的意识形态可以归纳为‘开民智、求变革’，其目的是为了唤醒全体国民，进行思想和现代意识启蒙。小说因为其易普及性被选作变革工具，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医治‘社会病’的良方。”^③

高玉就近代翻译在文化和语言方面的属性问题上，作了深入探讨。在《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古代性”》一文中他认为，中国近代翻译有层次区别，早期的科技翻译不同于后来的社科、文学翻译，前者主要是技术问题，后者主要是文化和语言问题。众所周知，文化翻译往往涉及深层的语言体系问题。近代社会译者所深谙的古代

① 顾建新《清末民初文学翻译方法与文学翻译文体发展》，《外语教学》2004年第6期，51页。

② 吴莎、屠国元《论中国近代翻译选材与意识形态的关系（1840—1919）》，《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年第11期，39页。

③ 同上，40页。